

中华第一龙



红山文化玉龙



唐千秋龙纹镜



唐鎏金铁芯铜龙

上的装饰物品。因为在这件文物的底部有个凸起,推测是用来插入到某个装饰物上的。

背有九五飞天龙

在中国古代数学中,龙的出现常预示着大人或圣人的降临。传说中千古圣人孔子就由龙托梦而生。东晋王嘉《拾遗记》曰:“周灵王立二十一年,孔子生于鲁襄公之世。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,来附在之房,因梦而生夫子。有二神女,擎香露于空中而来,以沐浴浴在。”封建帝王把龙作为自己专用的象征物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五次记载刘邦和龙的故事。“其先刘媪息大泽之陂,梦与神遇。是时雷电晦冥,太公往视,则见蛟龙于其上。已而有身,遂产高祖。”“高祖为人,隆准而龙颜,美须髯。”传说汉高祖刘邦的诞生及其形貌,都与龙有关。龙成为皇帝的专用名词,所以唐人相信龙能够把他们的心愿带给上天,便将写有祝福或愿望的玉简和玉璧、金龙、金钮,用青丝捆扎投入名山大川,希望得到上天的回应。把龙的姿态刻在铜镜上,把龙的纹样织在丝绸上,龙就能把人的面孔、衣袖变成天空,在上面飞翔。现藏西安博物院院的千秋龙纹镜即是皇帝赏赐给臣子的宝物。

1998年在西安市长安县郭杜镇出土的千秋龙纹镜,直径21厘米,重1.21千克。据资料介绍:此镜八出葵花形,圆钮。龙首近钮,身躯向上作C形绕钮盘曲。龙头结构清晰,双角后发须髯细密,张口吐舌,枕向镜钮。背鳍、腹甲、鳞片、肘毛刻画明晰。前肢一立一伸,后肢一曲一展。伸直的后肢与尾部纠结。四肢都露出尖利的三爪。龙周有三朵流云。近缘处一周凸弦纹与镜缘形成的八瓣小区内花叶、流云、方胜三种纹饰相间环列。方胜中的方格内有“千”“秋”二字。

此物与唐玄宗寿诞有关。开元十七年,玄宗将自己的生日定为“千秋节”,并作为全国的大节,举国欢庆。庆典上,玄宗要向四品以上的官员赐铜镜,群臣献寿,也要进献宝镜。这些镜子被称为“千秋镜”。“龙纹镜”就是千秋镜的一种。龙是天子受命的象征,云龙是千秋镜特征最鲜明的纹样。龙镜不仅可以辟邪、鉴万物,还护皇帝个人,而且还可以泽被万民。《全唐诗》收有龙护老人所作《铸镜歌》:“盘龙盘龙,隐于镜中。分野有象,变化无穷。兴云吐雾,行雨生风。上清仙子,来献圣聪。”唐玄宗有《千秋节赐群臣镜》诗曰:“铸得千秋镜,光生百炼金。分将赐群后,遇象见清心。”按白居易当时的官职,获赠千秋镜应是常事,所以他写有很多“镜诗”,他在《感镜》诗中云:“照罢重惆怅,背有双盘龙。”在《百炼镜》中有“背有九五飞天龙,人人呼为天子镜”的诗句。

中华民族是“龙的传人”。龙文化一直贯穿影响中华文明发展的悠久历程,特别是近代中国,龙的精神集中体现在中华民族爱国、奋进、抗争、自强的民族解放精神之中,为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。唐朝诗人李邕《上裴晋公》诗云:“四朝忧国鬓如丝,龙马精神海鹤姿。在龙年,我们要有龙马精神,有龙腾虎跃的干劲,勇毅笃行,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实现我们的共同梦想。”

龙马精神海鹤姿

郑言

今年是龙年。龙年是个吉祥的年份,充满着活力与激情,象征着变革与希望,预示着好运与繁荣。在我国出土文物中,关于“龙”的有很多,不同的时期,形态各异,但其内涵却始终如一。数千年来,随着中华民族文化兼容并蓄的发展,龙的演化也出现了包容性的融合。龙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精神核心的代表,是民族发展强大的精神动力。

大旗上画着两龙相交的纹样。中国古代北方的匈奴,南方的楚人、越人、粤人,西南的哀牢人和苗人,都是以龙为图腾的民族。

红山文化玉龙蕴含丰富的远古华夏文化元素,是当之无愧、实至名归的国宝级重器,被称为“中华第一龙”。2013年8月19日,国家文物局将红山文化玉龙列入《第三批禁止出国(境)展览文物》。

身骑飞龙耳生风

历史上各个朝代均按当时的审美观,创作出龙的形状。根据我国各历史时期出土的文物,石刻来看,红山文化的龙为滚圆形,头部有纹,身上光素,眼睛特大,眼睛多变,有圆、方、滴水形;商代的龙,身短似大象,饰以云雷纹,顶上一角,底下一爪;周代的龙,其身瘦长,纹饰稠密;战国时期的龙形为S状;汉代的龙开始向盘旋曲折、四腿的形象发展,称“马首蛇尾”龙;到了唐代,龙形变得非常活跃,一般都是张口鼓舌,俯仰

翻腾,其鳞以斜方格纹为多,其外形逐渐固定下来,基本已经是我们后来常见的“三停九似”了。“三停”即自首至膊是上停、自膊至腰是中停、自腰至尾是下停;“九似”即角似鹿、头似驼、眼似兔、项似蛇、腹似蜃、鳞似鱼、爪似鹰、掌似虎、耳似牛。李白有诗云:“身骑飞龙耳生风,横河跨海与天通。”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唐代鎏金铁芯铜龙就是以此形象而制作的。

1975年出土于西安市南郊草场坡的唐代鎏金铁芯铜龙,高34厘米,长28厘米,重2.8千克。通体鎏金,身体细长,造型流畅,颇具神韵。高昂的龙头与上身呈“S”形,龙嘴大张,露出锐利的牙齿,长舌在口中卷曲上翘,舌尖顶上颚。双目圆睁,直视前方,炯炯有神。前肢蹬直,两只前爪弯曲,紧紧抓住地面,肢骨关节尤为清晰,隐藏着力量带来的美。下腹、后肢与细长的尾巴还飘在空中,龙尾从高高上扬的尾部反折向龙头上方。背上带有两朵祥云,仿佛从天而降,极富动感,体现出唐代龙的生动美与气势美,堪称精品。

鎏金,是中国古代最高超的工艺之一,整体工艺流程十分复杂,这件鎏金铁芯铜龙是由

金、铁、铜三种金属构成,用铁铸芯,用青铜铸造龙身,最后再镀上金。鎏金层极其薄,与原胎器物贴合紧密,看不出是刻意装饰,几乎与金器一模一样。

在唐人的眼中,龙为“天之四灵”之一的东方之神,具有操控天神雷电之力,是镇邪扶正、调和阴阳、守财护土、守江护海、呼风唤雨的祥瑞之兽。据专家推测,鎏金铁芯铜龙有三种功能:一是镇宅避邪。草场坡一带为唐代长安城永业坊所在地,在此居住者都是门庭显赫的达官贵人。唐玄宗时期,此处是宰相燕国公张说的宅第。文献记载,法师曾告诉张说,其宅西北处有王气,不宜取土,一个月后,法师又告诉张说,其地被取土,恐有祸事,埋龙于地,可能就是为了恢复王气,达到消灾免祸、祈福求瑞的目的。由此推测,鎏金铁芯铜龙可能是张说的遗物。二是宗教祭祀之用。唐朝初年,奉道教为国教,而道教文化的祭祀就有“蘸祭投龙”的仪式,尤其唐朝的历代帝王对道教这种蘸祭投龙活动尤其重视,以此来祈求自身福寿和天下太平。三是车马装饰之用。“龙”是皇家的象征,见龙如见天子,因此这件鎏金铁芯铜龙,也许就是某个车马

唐朝的年俗和年味

善俊



唐墓壁画《宴饮图》

晚”。除夕夜里,家家户户院子里都会燃起火堆,唐朝人称之为“庭燎”,将节日氛围烘托得愈发浓烈。晚上还会上演“驱傩”仪式,即驱除疫鬼的仪式,人们在那天会戴上青面獠牙的面具进行舞乐表演,以此来驱走鬼怪,并祈求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平安祥和。

唐人的团圆饭吃什么呢?鸡、鸭、鱼等肉类,或者是各种时蔬,只要是美味都能搬上餐桌。比如,唐朝人流行的各式蒸饼、胡饼、汤饼,或是汤水和蒸笼里的牢丸……

和现在一样,唐朝不同地区会有不同风味的新年特色美食,甚至于不同的酒楼还能根据各自的风格推出不同的特色菜式。唐朝韦巨源的《烧尾宴食单》以及五代至北宋初年的陶谷在《清异录》里都提到过,唐时长安城里有一家叫“张手美家”的老字号餐饮店,每个节令都有特供的节令美食,其中元日所供的便是“元阳窗”,“窗”就是肉的意思。

在众多美食中,还有几样是不可或缺的,其一便是“五辛盘”,这是一道用五种辛辣蔬菜制作的拼盘,主要食材有大蒜、小蒜、韭菜、芸薹、胡荽等,唐朝人认为吃这些东西可以驱疾防病、发散人体内脏中的陈腐之气。

吃过了辛辣的,接下来就该吃甜的了,那就是“胶牙饧”,这是一种用麦芽制成的糖,吃起来黏甜,所以得了“胶牙饧”的名号。古人认为过年的时候吃它可以使牙齿变得坚固。白居易也吃这种糖:“岁盈后推蓝尾酒,春盘先劝胶牙饧。”

唐朝人的年桌上,还有两种酒非喝不可。一种是“屠苏酒”,另一种是“椒柏酒”。“屠苏”是由大黄、白术、桔梗等药材混合制成的,椒酒是用椒浸制的酒,柏酒用柏叶浸制。据说喝了屠苏酒和椒柏酒能驱寒祛湿、驱邪解毒。

新年后,唐朝人就开始走亲戚了,亲朋好友之间互相邀宴,时人称之为“传座”。初唐有个叫唐临的大臣在纪实故事《冥报记》中提到过:“长安市里风俗,每岁元旦以后,递作饮食相邀,号为传座。”过年时候走亲访友,欢聚一堂,走到哪家就吃到哪家,餐桌上不仅有酒、有美食,更有浓浓的年味。

唐朝的年,虽然在一些礼仪的表现形式上有点儿不一样,但是年的内核没有不同,那就一直象征着团圆,也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。

爱而知其恶 憎而知其善

清风慕竹

章惇是北宋与王安石一起锐意改革的政治家,但在《宋史》中,他却同蔡京等人一起被列入《奸臣传》,这除了修史者的政治立场之外,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他曾对国民男神苏轼极尽打压,使苏轼后半生九死一生。然而,公正地说,将章惇称为奸臣,还是比较冤枉的,章苏二人的反目,苏轼有大半的责任。

苏轼和章惇曾经是好朋友。他们是嘉祐二年同榜进士,后来苏轼任凤翔府节度判官,章惇任商洛令,都为陕西西路所辖。因为地域邻近,使得他们或公务或私下有颇多见面的机会,又是“同年”,二人“相得欢甚”,经常结伴游玩。

《高斋漫录》里记载说,一次他们曾同游仙游潭,这里地势十分险要,“下临绝壁万仞,岸甚狭”,之间架有一座独木桥。章惇让苏轼在对岸的绝壁题字留念,苏轼战战兢兢不敢前往。章惇则步履轻盈地跨过独木桥,用藤萝卷成的绳索,一头系在树上,一头缠住腰,“蹶之上下,神色不动”,然后用毛笔蘸着墨在石壁上写了几个大字:“章惇、苏轼来游。”章惇回来后,苏轼拍着他的后背说:“你将来必能杀人。”章惇问:“为什么呢?”苏轼说:“一个连自己性命都不顾惜的人,一定能杀人。”章惇听了哈哈大笑。

从这些记载看,章惇胆子大,是个狠人。但这并不影响苏轼和他的友谊,相反,苏轼对章惇评价极高,他在写给章惇的信中曾说:“子厚(章惇字子厚)奇伟绝世,自是一代异人。至于功名将相,乃其闲事。”

章惇与苏轼虽然在政治观点上存在差异,一个热衷改革,一个偏于保守,但他们对双方的友谊还是十分珍视的。章惇曾被贬湖州,失意后的他作诗给苏轼:“他日扁舟往来,共将诗酒狎渔樵。”而苏轼则回复道:“早岁归休心共在,他年相见话偏长。”这是纯粹的知己了,有回忆,有期许,期望年老了一起,泛舟江湖,把酒赋诗。对章惇真正的考验是“乌台诗案”,苏轼被囚禁狱中,生死未卜。宋神宗本无意严惩苏轼,然而时任宰相的王珪却欲除之而后快,进言说苏轼有“不臣之意”,并以苏轼在《王复秀才所居双松》里的诗句“根到九泉无曲处,世间惟有谗龙知”为例,添油加醋地说:“陛下您是飞龙在天,苏轼却认为陛下不能理解自己,要去寻求地下的蛟龙作为知己,这难道不是有不臣之心吗?”

好在神宗是个有文化的人,回答说:“这不过是诗人作词的手法,苏轼自己咏叹树松,和我有什么关系?”王珪一时语塞。章惇时任翰林学士,在旁听到王珪的话很是愤怒,当面怒斥他“人之事物,无所忌憚,有如是也”,

意思是说一个人无所顾忌地作恶,就像你这样子吧!在他的直言劝解下,神宗最终减轻了苏轼的罪行,仅将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。退朝后章惇还解气,又追着王珪质问:“你不是想使苏轼家破人亡吗?”王珪推脱说:“这是御史舒宣说的。”章惇反唇相讥:“舒宣的口水难道你也吃吗?”堂堂宰相被章惇问得无言以对,狼狈不堪。

苏轼被贬黄州后,原来的许多朋友都害怕受到牵连,不敢再同他交往,而章惇则一如既往地寄来信件和礼物,加以安慰。苏轼很受感动,他在给章惇的信中写道:“惟子厚厚居遣我以药石,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,真与世俗异矣。”意思是说只有你章惇在我落难时施以援手,送药给我调理身体,即使在困苦的处境中,也一直想办法体恤救助我,这跟世俗的人完全不一样。此时,章惇对苏轼的友情,可以说是患难之交了。

然而,他们的友谊在随后就发生了转折。神宗驾崩后,哲宗年幼,高太后垂帘听政,重新起用司马光等旧党人物,苏轼重回权力中枢,被委以重任。旧党人士上台后,对新党展开了清算,作为骨干的章惇成为主要的目标。而出乎章惇意外的是,好朋友苏轼的弟弟苏辙也加入了攻击他的行列,苏辙的《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》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,他被贬知汝州。更令章惇不解的是,苏辙攻击他时苏轼不仅不劝解,在他被贬之后,苏轼又上疏《缴进沈起词头状》中,指控章惇附和王安石谋求边功、草菅人命。苏轼的落井下石、忘恩负义让章惇彻底寒了心。

八年后,哲宗亲政,章惇重掌权柄,开始了对苏轼的猛烈报复。先是将他贬放定州(今河北定州),后又改知偏远的英州(今广东英德)。当苏轼一路舟车劳顿,饱受颠簸,尚未到达英州之时,新的贬谪指令又来了,贬谪他到更为蛮荒偏远的惠州(今广东惠州)安置。当苏轼写下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时,一纸诏书,又将他贬至被称为瘴疠蛮荒之地的儋州(今海南儋州)。苏轼被贬路途之艰辛,清代学者王文浩感叹:“公方稍安,而后命已至……每为三叹。”

俗话说风水轮流转,元符三年,宋徽宗即位,章惇贬谪潭州(今湖南长沙),而苏轼则奉旨北归。章惇的儿子害怕遭到苏轼的报复,写信给苏轼试探口风,苏轼会心一笑,写下了著名的《与章子厚书》:“某与丞相相交四十余年,虽中间出外稍异,交情固无所增损也。闻其高年,寄迹海隅,此怀可知。但以往者,更说什么益,惟论其未然而已。”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,还有什么不可忘怀的呢?还是展望未来,过好以后吧!不久,苏轼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,五年之后章惇也在贬所湖州去世,二人的恩怨纠葛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。

人之一生,有时没有绝对的好,也没有绝对的恶。《礼记》上说:“爱而知其恶,憎而知其善。”喜欢一个人应该知道他也有短处,憎恨一个人也要知道他的善处。或许,这才是我们评价苏轼和章惇该有的态度,也是生活里处世的智慧。